

# 张澜崇尚学习二三事

燕宏博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当时已是77岁高龄。在工作中,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精神特质,便见贤思齐,加强自身学习,且勉励他人学习,留下了一段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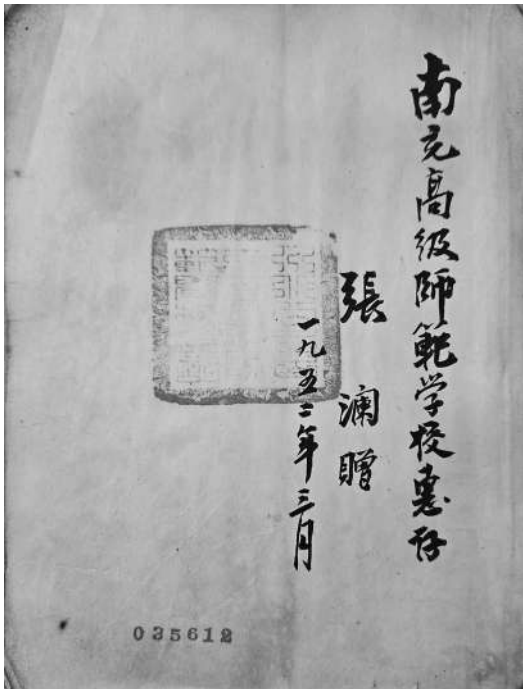
## “亦系取学习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在与中共领导人共事中,很快发现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特质。1950年2月12日,他致函蒲跃文说:“新政府之作风,最注意者是组织,是学习……”1950年2月14日,他致函贾子群说:“我在此不日与中共首脑部接触,深知他们的作风,尊重组织,尊重学习。”1950年2月22日,他致函魏时珍又说:“须知中共的基本精神,即批评与学习,他们视学习等于生命,以批评提高警觉。”同日,致函叶平琦说:“同时并须了解新政治的作风,最重组织,最重学习……”1950年3月4日,致函曾铁珊再次说:“中共视学习如生命,军政要人,常常以小生自居。”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张澜致函不同亲友都提到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尊重学习”“视学习如生命”,精准抓住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的精神特质。

受中国共产党人感染,张澜开始重视加强自身学习。1950年2月10日,他致函王恩洋、蒙文通说:“澜在此亦系取学习态度,盖深知唯有学习,才能养成新的人生观,唯有学习,才能使全国之人,燃起已熄之火炬,奔向历史的黎明。”1951年2月22日,他致函邵芸云说:“老解放区的学习气氛,几已弥漫任何机关、任何角落,无职业者要学习,有职业者更要学习,青年要学习,老年亦要学习,吾在此亦系取学习态度。”1951年3月31日,他作《在中央人民政府祝寿会上的谢词》说:“今天我愈是年老,愈感觉什么都不够,什么都要学习,都要向毛主席学习,向今天在座诸位学习,向一班年轻人学习,我今天80岁了,我还有一个要好好学习决心,18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无论“亦系取学习态度”,还是“老要学”,张澜都表明了加强自身学习的态度,努力让自己跟上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

## 勉励亲友加强学习

张澜不仅加强自身学习,还勉励亲友学习。1950年2月10日,他致函



张澜题签捐赠的《毛泽东选集》

时任北大校长王兆荣说:“今后壁划,度驻校代表当有指示,所望精诚合作,频频接受新的理论,勉维现状,徐图发展。……愿吾棣台……虚心学习,积而久之则信誉日隆……”1950年2月11日,他致函老友王青干之子王泽丰时说:“所望益自策励,多阅新书,多接新人,刻意学习,蔚成抱负……”1950年3月28日,他致函蒲肇楷说:“入盟之后,并须下大决心,重新学习……”1952年9月26日,他致函何清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文学理论之阐发尤明,希详加揣摩。”

张澜还向子女阐释学与习之间的辩证关系,鼓励子女学有所得。1953年10月24日,他示三子张晓岩:“我们今天国家人民,要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为人做事,必当随时随处加强学习。学是觉所未知,习是为之不已,所学即所用,就是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学要虚心,才能多受教益;习要小心,才能少犯错误。”

张澜鼓励亲友学习,是为了让他们建立起新人生观,以适应新社会。1950年2月11日,他致函老友鲜英说:“这便需从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痛下功夫,彻底改变。”1950年2月14日,他致函杨光炬说:“因此知识分子所应致力者,如怎样克服自尊自大的心理,向工农苦学大众看齐,怎样建立新的人生观,勉与新政令相配合,此中窍要,端在学习。”1950年3月28日,他致函蒲肇楷说:“一定要经过学习阶段,建立起新的人生观……”

对亲友爱好学习、学有所进步,张澜也给予充分肯定。1950年2月20日,他致函吴玉章,介绍朱光潜夫人奚今吾进入学习班,所提理由是:“……近更坚决立志学习,请求进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第五期学习,特为介绍,请准收入为幸。”1950年2月20日,他致函董必武,推介刘文辉秘书宋岳亭所作文章,亦称:“宋君系一前进并可靠之青年,志在学习,并不计较个人地位也。”1953年10月19日,他致函黄应乾说:“关于你的名位思想,已通过学习而逐步清除,使我甚为欣慰。”无论是向人推介,还是致信鼓励,都表明张澜先生对爱好学习者的肯定和赞赏。

张澜不仅勉励亲友学习新理论,建立新的人生观,而且多次为亲友、下属提供学习资料。他曾会同沈钧儒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编辑的《学习资料》赠给民盟广东省支部、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广州市支部。据笔者统计,张澜亲笔题赠给民盟广东省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题赠给民盟西北总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和第六辑,题赠给民盟西安支部有第一、二、三辑合订本和第六辑、第七辑,题赠给民盟广州市支部有第四、五辑。根据上述情况推测,张澜与沈钧儒应是给《学习资料》逐期分赠给民盟各地支部学习参考。

## 自费捐赠《毛泽东选集》

张澜曾自费购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赠给家乡教育机构、民盟支部和亲友,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深入钻研”。1951年10月,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校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发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级领导干部也只能凭“购书证”购买。张澜1952年4月15日致贾子群函中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虽已出版,惟购者踊跃,特规定按前发‘购书证’号码发售。复查前次购赠该书第一卷五十册的原‘购书证’……”可知张澜曾自费购买50册《毛泽东选集》。另同函称“(购书证)已有二十张散失,故目前凭证仅能购买该书第二卷三十册”,可知张澜最初只有50张“购书证”,即只能购赠50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又据1952年1月9日致贾子群函“前由张默生携回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五十册,希分交所属组织……”另据1952年1月3日致张默生函“前月曾邮寄毛泽东选集20册交你”,可知这50册《毛泽东选集》是由张澜寄给张默生,再由张默生会同贾子群分配的。其中,有20册应该是交由张默生分配处理。至于另外30册《毛泽东选集》如何分配,可从张澜1952年4月15日致贾子群函称“苏联名哲学家尤金博士所作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兹寄上三十册,即分赠南充各所学校及有关方面……”并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购买寄上。仍希分赠各方藉供学习。”可推测张

澜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分赠南充各所学校及有关方面”。

据民盟南充市委干部贾德灿《张澜情牵梓里》一文,他发现川北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前身)1952年3月24日致民盟川北支部兼南充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公函称:“顷奉到你会转来张澜副主席惠赐我校的《毛泽东选集》共10册,除存图书馆供师生学习外,敬致谢忱,即请转达是荷。”贾德灿花费很大工夫,在西华师范大学旧书库中找到3册题有“川北大学惠存,张澜赠,一九五二年三月”字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彻底证实了其中10册《毛泽东选集》下落。考虑到贾子群时任民盟川北支部及南充市分部主委,可以推测川北大学收到的10册《毛泽东选集》应是贾子群转赠的。

2022年,笔者曾从南充书友处得到一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系1951年11月北京第二版出版,两处钤“川北公立南充高级师范学校记”戳印。在书的环衬页有题签:“南充高级师范学校惠存,张澜赠,一九五二年三月。”与赠给川北大学的时间相同,应是同一批赠书。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结合赠给川北大学10册,可以推测贾子群亦应将10册转赠给川北高等师范学校。还有10册《毛泽东选集》,贾子群转赠哪些学校或机构,笔者推测应在四川省立南充高级蚕丝职业学校(今四川省蚕丝学校)、川北南充高级中学(现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等与张澜相关联的学校范围内,因尚未见相关资料,无法确知。此外,张澜在1952年4月15日致贾子群函中提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俟发售号码轮到时,即行购买寄上”。因既未见到赠书,也未发现其他史料,最终是否购买、寄赠南充各方,也不确知。

笔者个人喜好收藏签名本。每当我用手摩挲这册珍贵的书籍时,特别是通过梳理张澜晚年崇尚学习的良好作风,笔者深深为张澜活到老、学到老的伟大人格所感染。崇尚学习精神的他,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作者系沈阳市政协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处长)

## 马叙伦教育有方

周二中



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马叙伦是政治活动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1922年夏,马叙伦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一校之长,责任重大。一天,马叙伦经过一间办公室时,听见里面传来吵闹声。他走进去一看,发现一位教授正在火冒三丈地训斥学生。

马叙伦问教授:“怎么了?”教授说:“校长,你来得正好。这个学生,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都不上,跑到食堂买饭。大家要是都像他这样,这课还怎么上?”一旁的学生低着头,很惭愧的样子。

马叙伦一听,感觉事情有些蹊跷,他让学生坐下来,和蔼地问:“这位同学,学业为大,这一点我想你是知道的。但你之所以早早去食堂买饭,我想你一定是原因的,如果你信任我,不妨说出来,或许我能帮助你。”

一听这话,学生红着脸抬起头看了一眼马叙伦,怯怯地说:“校长,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来自农村,饭量大,每天早上吃得也不多,所以每到第三节课就特别饿,有时感到头昏心慌,也没心思学习,所以就偷偷跑到食堂打饭,不想被老师知道了。”

马叙伦听到这话,略停顿了一下说:“这位同学,你说的问题不怪你,这是我们的责任。学校不能让同学们吃顿饭,我很难过。我决定,从今天起,将中餐的时间提前半小时。同时,米饭加量不加价。希望同学们首先要吃饱,然后再好好学习。”学生一听这话,感激地说“谢谢校长”,说完向校长鞠了个躬,走了。

教育不能一厢情愿,多听听学生的反映,多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找出解决办法,也许事情才会获得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马叙伦就是这样做的。

## 洪深做上校科长

刘兴尧



洪深是个文人,而且是个戏剧家,他不但能写戏,还能上台演戏。抗战时洪深真的穿上军装,还做了上校。

原来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武汉成立的一个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下设三处九科,管着宣传队、抗敌演剧队等。当时请洪深担任六处一科科长,授予上校军衔。说实话,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洪深还不大适应,他心底里是不想做官的,他就是为了不去做官才去学戏的,没想到还是逃不掉做官的命运,而且还是做“武官”。他坚决推辞。后来,阳翰笙劝他说,这是抗战需要,而且当时周恩来做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厅是周副主任领导的,洪深一听是周副主任领导,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这是国民党当局借口不把完整城市留给日本人而自己放的。其实,受灾、受苦的还是长沙的老百姓,当时第三厅的多支演剧队

奉周恩来、郭沫若的命令去长沙救灾,具体由洪深负责。

那段时间,洪深这个上校可忙惨了,他亲身参与抬尸体、发放食物等工作,为了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他指挥大家掩埋尸体并消毒。最可恶的是,日本人的飞机还经常来捣乱,根本不让好好救灾,尤其是发放救济款的时候,虽然一人一块钱,但队伍排得老长,鬼子飞机老是喜欢炸四处乱跑的人,似乎有一种变态的满足。

针对这种情况,洪深爬上高台讲话,他说,飞机来了不要慌,更不要乱跑,一科的人不许跑,你一跑来百姓就跟着跑,飞机轰炸会伤亡很大,如果一科的人跑了,军法从事。领救济金的群众也不要跑,不跑就没目标,飞机肯定就飞走了,千万不能慌,大家一看是穿着军装的大官在讲话,就信了。

果然,一会儿飞机来了,人群没慌,井然有序地领着救济金,飞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大家都佩服洪深的冷静沉着。

## 陈嘉庚建议“汉字横写横排”

周惠斌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嘉庚向大会提出了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至右横写、横排的提案。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与甲骨文、竹简的使用有着紧密的关系,竖写的习惯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清末,西风东渐,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汉字应由竖写改为横写的观点,虽然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和响应,但由于传统国粹势力根深蒂固,汉字横写横排的推行依旧步履维艰。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协商会议。陈嘉庚和外国人接触广泛,对各国文化了解全面,他认为,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有必要对汉字书写进行改革,由竖写竖排改为横写横排,以便与国际接轨。因此,他在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了“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至右横写、横排”的提案。这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该协会78位理事之一。

1952年2月5日,郭沫若、胡愈之等在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上也提出了中文“必须自左而右地横行”的建议。在陈嘉庚、郭沫若等著名人士的共同推动下,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将竖排版改变为横排版,率先试行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竖排,改为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并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的文章:“我们认为现代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

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汉字横排横写”的决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件的横排、横写。”11月,全国17家中央级报纸已有13家改为横排方式。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仅有少部分标题和文章采用竖排。至此,汉字横排横写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这时,陈嘉庚提出“汉字横写横排”的提案已经过去了5年多的时间。

## 徐悲鸿与钟馗画

郑学富

徐悲鸿画马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人物画也是独具风格。他把西方绘画基础运用到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巧中,形成了鲜明的个性,这对现代中国绘画人物画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重庆画了很多有关钟馗的人物画,以钟馗打鬼驱邪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奋起抗争的精神,展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爱国情怀。

徐悲鸿是善画钟馗的高手,他画钟馗与前人明显不同,只取其名,却褪去宗教本意,并将之纳入其写实主义的体系之内,其形、其神、其意,均由神佛之“虚”转为人世之“实”。从技法上看,徐悲鸿不取传统钟馗形象的古怪、夸张,他将西画中的素描技巧融入传统绘画中。他笔下的钟馗形象多是近景特写,造型生动逼真,保留了人们所熟悉的络腮胡,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审美趣味,如浓眉

大眼、宽口阔鼻等等,少了一般钟馗形象的丑陋和狰狞,却更像是一位威武刚烈、坚贞不屈的英雄好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的搬迁来到重庆沙坪坝。1938年夏,日军已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面对山河破碎和日军的频繁轰炸,徐悲鸿以笔为戈,创作了大量宣传和讴歌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他曾说:“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这一时期每年的端午午时至刚至阳之时,他都创作钟馗图以强化驱凶除煞之气势。

1938年6月2日端午节中午时分,徐悲鸿在沙坪坝奋笔疾书,画了一幅《钟馗》。民间有端午节在大门和堂中悬挂钟馗像的习俗,徐悲鸿借端午节挂钟馗像驱鬼的习俗,抒发忧愤之情,寄托爱国情怀。一身浩然正气、刚劲雄强的钟馗侧首回望,似在藐视那些猖獗一时、祸害人间的邪恶势力,又似在魑魅魍魉的肆虐和淫威



徐悲鸿作《钟进士》

下,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与右侧矮小猥琐、颌首低眉、头顶果盘、手提酒壶的小鬼形成鲜明的对照。

《钟进士》作于“己卯(1939年)端阳正午”,表现了钟馗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徐悲鸿就依据此描绘钟馗奇伟之相貌,虬髯飘拂胸前,腰佩宝剑,侧身而立,威风八面,不怒自威,他双手倒背,握着一只空酒杯,等待小鬼开酒侍候。小鬼赤身裸体,形象丑陋,屈膝跪地,一手抱着酒坛,一手握着坛盖,小心翼翼地打开酒坛。作品以钟进士喻中华民族顽强不屈,不畏强敌,终将战胜日本侵略者,让其俯首称臣。体现了中华儿女勇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徐悲鸿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钟馗题材的作品,诸如《持杯钟馗》《持扇钟馗》《持剑钟馗》《钟馗饮酒》《侧面钟馗》《捉鬼钟馗》等。这些作品将钟馗描绘成身材伟岸、相貌堂堂、神态威严、嫉恶如仇的人物形象。塑造造成人间正义的化身,紧握宝剑,除暴安良。与其对应的是一身材矮小、鄙陋卑劣的小鬼,象征日本侵略军,并将其画成没有头盖骨,以表示其野蛮愚蠢。

徐悲鸿不仅以作品鼓舞人民,还在海外举办义卖募捐画展,多次将售画筹募的巨款捐赠给祖国,支援抗战。

## 老舍的温婉

张雨



1918年7月,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直接被京师学务局委任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

老舍来到学校不久,许多学生家长到老舍那里告状,强烈要求辞退许文烈。家长们情绪非常激动,说:“许文烈虽然教书不错,但对学生要求极其苛刻,凡违纪的学生,就会用戒尺体罚,并且还常常打断戒尺。”老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先安抚了家长们的愤怒,而后对家长们说:“这个问题我一定会高度重视,请各位家长放心,我会以最快的效率把这件事处理好,给你们一个信得过的说法。”家长们听了老舍的话后,情绪慢慢趋于平复,继而谢过老舍后,都离开了。

第二天,许文烈上课,老舍站在教室外听他讲课。老舍心里暗自佩服:许文烈的课讲得确实精彩。等他下课走出教室时,看到老舍正站在教室外。许文烈以为老舍来训斥他,准备匆匆离开。老舍却微笑着对他说:“许老师,我在外面听了你多半堂课,你的课讲得很有激情,声情并茂的,学生们能遇上你这样有才华的好老师是一种幸运呀,我都把自己当成你的学生了。”

许文烈没想到老舍不但没训斥自己,而且还当面夸奖自己,反而弄得难为情:“校长,课讲得好有什么用,我们班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许文烈知道学生受不了他的严厉,很多都转校了,不等老舍开口,就主动说了出来。

“这的确是个问题。”老舍皱了皱眉头,但话语仍是温婉,“师者,严在该严处,爱在细微中。教育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我相信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老舍拍了拍许文烈的肩膀:“下次我来听课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教室里一定座无虚席。”许文烈看着老舍远去的背影,他向老舍深深地鞠了一躬。

后来,许文烈不再体罚学生,而是按照老舍的教育方法去管理学生,很快,转走的学生又重新回到他的班里,家长一致肯定老舍的治校有方。

老舍被时人誉为“最好的校长”。因为他就像家长们所说的治校有方,他从不摆校长的架子,平易近人。“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都温婉于己,纯善于心,因而受到全体师生的爱戴与敬仰。